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七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三七期 ——
（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304d）

【研究动态】高文谦新书《晚年周恩来》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突破	方 冰
【千秋功罪】高文谦采访录	魏 城
【秉笔直书】高文谦为什么写《晚年周恩来》	慕育金
【往事追忆】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	高振普
【外论摘要】“文革”中的周恩来	矢吹晋
【史海钩沉】周总理治病真难	佚 名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动态】

高文谦新书《晚年周恩来》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突破

• 方 冰 •

首部以中共文献档案和当事人采访记录为基本材料写成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晚年的周恩来》星期五在中国境外出版。旅居纽约的作者高文谦是当年中国官方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他说，他顶着北京远隔重洋施加的种种压力，历经五年终于使之面世。书中援引了很多尘封了3、40年的史料，描绘了十年“文革”期间的宫廷内斗，试图披露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历史人物的真面目。

1976年1月8日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病逝引发了民间声势浩大的悼周、拥邓、讨江、射毛的四五运动。老百姓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显然在放纵四人帮对他几十年老战友的进行无情打击。但是中南海的高墙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无从知道。

时隔近三十年，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在四月五日出版的新书《晚年的周恩来》中，对此做了十分具体的披露：周恩来1972年5月在例

行体检中被确诊患有早期膀胱癌。他的医疗专家向中央提出了立即进行治疗的报告，但是报告到毛泽东手中却被批了四点指示：“要保密、不要检查、不要开刀、加强护理和营养”。周恩来被瞒了整整10个月，直到出现血尿才被告知。然而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仍然命令医疗组只准检查不准治疗。

高文谦在书中说，这件事涉及到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时至今日仍然三缄其口。大陆官方更是讳莫如深，唯恐这种杀人不见血的事情揭露出来，损及毛的“伟大形像”。

高文谦说：“毛为什么要在周这个问题上去做手脚，他有他的动机在里面的。这个动机就是他担心他活不过周，而对周他身后不放心。”

◇ 毛周关系矛盾重重

书中揭露的毛对周的虐待式迫害，同大陆官方一向粉饰毛周之间关系的宣传形成鲜明对照，但是却印证了民间长久以来的许多猜测。令人震惊的是高文谦说，周恩来并不是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最终的话变成了等于毛叫周去死，周也就只好去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者叫做顾全大局。一切交给党安排。党去安排去吧，党就是毛。”

高文谦说，文革中周信守的最重要一个政治底线就是要跟着毛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保持晚节。书中对周为什么会对毛有如此愚忠，也从历史上对毛周关系进行深入考察。比如说，周曾经很长时期是毛的顶头上司。他后来变成了毛的助手并不是中共党史上一贯宣称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周之间历史恩怨的根子是1932年的宁都会议。而周作出自己一辈子要扮演拥戴毛的历史角色的决定，则是在延安整风中被毛当作经验宗派同王明的教条主义一起狠批之后。

高文谦认为，重新评价周恩来，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涉及到了中共政治体制的要害：“周的忠君思想、相忍为党、忍辱负重、以大局为重这类东西是中共摆平内部思想分歧，维护党内团结，或者是维护党的统一意志的有效工具，这个工具不能丢。丢了以后内里就不好办了。”

高文谦说，作为中共党性的楷模，周恩来的道德形像和教化作用，是维护中共以一个核心为特征的集权体制的一种凝合剂。因此不把周恩来从中共的神坛上请下来，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就改变不了。也基于同样原因，高文谦对周恩来的研究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北京的巨大压力。他们先是阻止他写作；当书写成后，又企图以重金收买版权。高文谦的母亲曾经在文革中被以现行反革命关押秦城监狱达7年之久，出狱后落下一身疾病。北京有关方面甚至暗示如果出书他母亲将遭不幸。高文谦说：“他们说，你妈妈一辈子受尽了磨难，希望晚年不要给她带来新的磨难，再遭受不幸。”

◇ 继承史家秉笔直书传统

现居住纽约的高文谦出身于中共的革命干部之家。父亲是延安抗大毕业的部队高干。母亲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代。1989年的六四镇压促使他下决心还文革的历史真面目。为了尽他对母亲的孝道，高文谦历时五载完成写作，其中加上同北京周旋，直到母亲于2001年底去世，他完全解除了出版此书的后顾之忧。

高文谦说，他了解这本书出版的后果，也做好了精神准备。但是他说，一个国家总是要有

人敢于站出来讲真话：“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更是要继承中国史家甘冒杀身之祸、秉笔直书的传统；站出来为历史存真、为历史作证，真正从中吸取历史教训。个人不足取。而且我觉得这一工作很有意义。一个人一生中做这么一件事情也就可以了。”

《晚年的周恩来》在1976年“四五”运动27周年之际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该书共600多页。除了把周恩来放在文革背景中考察其同毛的关系，其中还带出了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有关林彪的部份就同大陆官方的说法大相庭径。比如，载入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不到三年就落得个仓惶出逃、折戟沉沙，对此大陆官方的解释千方百计淡化毛的幕后角色。高文谦根据许多当事人的采访记录和中共档案文献，认为林彪同毛泽东的主要分歧始于林彪希望抓经济，而毛要不断革命。他的最后出逃是毛对他步步紧逼的结果。

以研究周恩来而被中国政府以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罪名逮捕过的美国迪金森学院高级研究员宋永毅说，他没有机会接触档案文献，通过搜集民间文革资料进行研究。他认为，高文谦《晚年的周恩来》一书的出版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突破，不仅还了历史的真面目，而且还了中国公民对高级领导人的知情权，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忠孝两全的榜样。宋永毅说：“对于高文谦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这个都值得我们来赞赏来研究。他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老是喜欢拍领导马屁、老是喜欢捞一官半职，他改为对历史的忠实、对公民的知情权的忠实。”

◇ 原始档案出版越多越好

历史学家余英时也表示，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只有等到真实的史料公开披露才能进行研究。现在只有少数能够接触到档案文件的人可以做。所以他很高兴有高文谦写的这种书出现：“我非常赞成的。我就希望他们多多利用中央档案的文件才能把真相弄出来。我们不能笼统说共产党怎么，那个好像你在谴责一个你不喜欢的政党而已。所以史学家必须看文件，原始档案越多越好。”

余英时说，今天北京对周恩来和文革的研究百般阻拦和禁止，原因还是怕牵涉到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如果真正彻底否定，共产党本身就成很大的问题了。她宣传这种历史的根据、上台的理由都没有了。她就成了权力、暴力的集团而已。所以他不能把整个真相都说出来。我想他禁忌的原因还是怕人民对她政权的怀疑。已经有了但是到底没有真正出现文件。毛泽东到底怎么做的？周恩来怎么做的？林彪怎么活动的都还不知道嘛！”

不过在对周恩来的具体评价上，海外仍然有很大分歧。宋永毅对周恩来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观点不表同意。他认为周是一个维护专制、忠于暴君的奴才和被虐待狂：“你是一国的总理，你把这个国家，从他担任总理到他76年死掉，这个国家太平过没有，老百姓过好日子没有？你这个总理要不要负责任？难道就一句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就不要负责任了吗？”宋永毅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历史的是非与责任就分不清。但是宋永毅说，无论如何文革的盖子已经揭开，历史的真面目再也捂不住了。

□ 本文为“美国之音”报导

~~~~~  
【千秋功罪】

高文谦采访录

• 魏 城 •

#### ◇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

问：有关您即将出版的这本书，是不是有关于周恩来，题目是《晚年周恩来》，那么是不是偏重于写文革？那你个人从大量的史料来看，周恩来到底是主动参与文革还是被动拖入文革呢？

高：从我接触的材料来看呢，他总的来说是被动拖入文革，可以说是被毛泽东拖下水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在这个里面，他自己极力想紧跟，在政治上想保住自己，但与毛泽东相比，思想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问：我从书的介绍中看到，“没有周，毛就下不了发动文革的决心。”是不是这样呢？

高：实际上是这样的，毛在为发动文革政治布局的时候，毛是采取了几手。用我的话讲是：联林拉周整邓倒刘，他对中央一线的几个人是分化瓦解，拉拢怀柔兼备吧。是这么个情况，周在毛发动文革时是一个借用力量，不是一个基本力量。

问：周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他的内心历程是怎样的呢？是内心分裂痛苦呢？还是心安理得，或是助纣为虐？

高：从我的材料来看呢。恐怕来说，他的内心也有他悲苦的一面，但是政治上他决心要跟着毛走。就是这么个情况。

问：你总体的评价，周恩来在文革上到底是起了什么作用？比如说有人认为他保护了很多，很多中共的老干部，那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保护这些老干部呢？

高：对于周保护老干部这个话题，这是作为文革之后大肆宣扬的，我当时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这个基本的事实也存在。比如说北京军区的老司令傅崇碧，他就是写到“大树参天护英华”，这就已说明周在文革中保护了不少的干部。他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把英华都保护住了。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只是反映了一方面的情况，还有一个小节，在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实际上，周在保护干部的事上是非常的小心翼翼，可以说是一直在看毛的脸色行事。他需要在毛、林、江三种不同的利益关系中找到不得罪任何一方的平衡点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事也是很难的。另外他作为中央碰头会的一个成员，那些大案要案，他也难脱干系。

问：那能不能说，他保护的一些干部是在毛的首肯下，他才进行保护的呢？

高：这可以这么说，没有毛的首肯他不会做出任何事情来，特别是像刘少奇的那些人的话，他是不会援之以手的。

#### ◇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问：我们所谈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也是您书中的主要核心。您从大量的史料来看，毛和周在长期的合作中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高：毛周关系的话题就很长。简而言之，毛周关系是现代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当然其中有一段过程，35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节点，42—43年的延安整风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关节点。延安整风之后基本上是一种君臣关系。不过是具有现代意味的。虽然和古时候不一样，但骨子里是一样的。

问：如果是君臣关系的话，那为什么在文革后期，又出现了批周的运动呢？是否在毛的默许下进行的？

高：当然是的了，任何大的运动没有毛的默许是绝对干不了的。

问：毛为什么会对他最忠诚的大臣进行这样的运动呢？

高：毛批周主要是在林彪事件在之后。在这之前，毛对周有几次不满意，但周毕竟是党的第三号人物。林彪事件之后，历史把周推上了党内第二号人物，而毛那时候年事已高，也生重病，他急于安排后事，但他觉得周在政治上有异心。因为周在批林和收拾文革残局时，他提议批左，这就碰到了毛的痛处。另一方面，自林彪事件后，周在党内外的声誉大起，外交上大有突破，西方报纸上把这报导成为“周恩来外交”，这使得毛心里很不是滋味。毛认为周想以林彪事件来不动声色的扭转国内的政局。

问：从思想路线上来讲，周恩来是倾向于毛的思想，还是倾向于以刘邓为代表的务实路线呢？

高：这时要看在哪一段历史情况下，您是指哪一段历史？

问：是文革时期。

高：在文革中又可以分割成很多小的段落。我是觉得周在思想路线上和毛在治国理念上是不一样的。毛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国，政治挂帅，搞政治运动。周还是比较务实，比较关注国际名声。这是他们俩之间的分歧，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就已有不少的磕碰。反冒进的问题上，周已是挨了毛的批，被指离右派还有50米远，几乎在南宁会议上，毛每次都批周，后来周不得不提出辞职。文革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顶峰。我在书中说到周在林彪事件之后大哭一场，其实这个材料是出自于我当时亲访纪登奎，他谈出来的，核心是周一一直是觉得有志难酬，在治国理念上和毛格格不入。

#### ◇ 周恩来与刘少奇的关系

问：您刚才说，周在治国理念上和毛格格不入，周可以说是更接近刘少奇。那我们就谈谈周刘关系，在文革时，周看到刘被整，应该是有兔死狐悲的感觉，但为什么周反而是参与整刘？

高：刘周关系可以是追溯到延安整风。周在党内资历和才干上一直是都是超过刘的，而且周还曾当过毛的顶头上司。延安整风的时候，周恩来和王明都是挨整，那么确立了毛在党内的绝对领袖地位，在这事上呢，刘是出了大力的。所以刘是作为毛的第一助手，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压到周的上面去了。长期以来，他们是作为权力斗争的对手。他们的关系在客客气气的后面是权力斗争的对手。

当时，刘少奇是党内政治路线中白区的代表。其实周在白区工作中花费的精力和取得的成果并不比刘差，可能还更胜一筹。但是在45年的政治决议中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刘少奇。这是一种政治需要吧。邓小平当时也是这样吧。文革中，周其实也是有兔死狐悲的感觉，所以他在整个运动中的调门，跟江青和其他人比是有差别的。他始终不冲到前面去。在我书中提到他对刘少奇的下场，难免有兔死狐悲的感觉。周决定政治路线上跟毛走是他晚年最重要的政治操守和原则。整刘是毛在文革政治战略中最重要的一步棋。当时是整到哪一步算哪一步。

但是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毛就意识到只有把刘少奇定罪，彻底打倒才能说明文革的成果。

所以当毛真正下决心要整刘的时候，周还是讲两面话。他一方面强调这是一个在九大召开前的重大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要谨慎。后来就把他从第一线撤下来了，让江青上去了。

老毛实际上很清楚周的想法，就说“你想洁身自好，对不起。我要让你在中央全会上做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审查报告。你乾净不了。就算以后历史翻案，你也难逃后人的责备。”我的书中把这个过程讲得很清楚。

问：那么说，是不是周和刘的矛盾是利益上的冲突，而不是治国理念上的矛盾？

高：周和刘之间在治国理念上只有刘比周更左的一面。周的为人比较沉稳，刘容易在政治上走偏锋。像64年搞的“四清”运动，毛已经够左的了，刘少奇的很多东西比毛还左。刘干起来更尖锐。关于周刘之间的利害关系，其实是毛刘之间的利害关系。周因为在政治上跟毛走，所以就跟刘一刀两断。

#### ◇ 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

问：我们现在谈谈更有戏剧性的关系，那就是周与林彪的关系。在文革中如果说林彪是第二号人物的话，那周就是第三号人物。我们往往看到林彪跟着毛走得很近，周却要和林拉开一点距离，那么，人们所感兴趣的是，周和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高：周和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要从两人的历史上来看。周在党内的辈分是很高的。在黄埔军校，林还是周的学生。当时，周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林彪则是第四期的学生，所以差得比较远，很多元帅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两人都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周一一直是林的直接领导。到文革时，毛把林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放在第二位。周作为党的第三号人物就在林的下面。

从我的观点和收集的材料来看，长时间，林是周的下属，所以周特别注意和林的关系，特别注意尊重林彪，以免落得一个话柄。再有的话，人们也都知道，在九大以后，在政治格局上有两大派：一个是林彪一派，包括陈伯达、黄、吴、叶、李、邱，即四大金刚加叶群；那边是文革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毛林是上面，平时不出席政治局会议。周就是主持政治局会议。两派斗争是越演越烈，周夹在中间是非常为难，但他的长处是平衡，善于在矛盾对立中保持自己的政治平衡。但是在更多的具体问题上，他还是更多的偏袒林彪这一边。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林彪的人，黄、吴、李、邱都是军队里的将帅，军队历来是讲究资历的，周恩来比他们都高，这和文革派是不一样的。再有后来陈伯达在九大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被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周和林的政治理念是一致的，这个报告事先经过周，得到了赞成，林彪看到周的态度，也觉得是一种鼓舞，所以是花了精力和陈伯达一块按林彪的意思起草了这篇报告，但最后这报告被认为是唯生产力论的报告。所以九大之后，周林两人之间更多的是同多于异。

问：海外有一本书，叫《林彪之死》，说周恩来在倒林中起到了非常主要的作用，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有多大呢？

高：这没有可信性。这本书我也看到过，是王兆军先生写的，主要是文学笔法，推断论。基本材料都是道听途说的。

问：实际上，周在倒林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高：周在倒林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前提是毛林交恶。这和毛刘交恶是一样的道理。刘和周在政治理念上是同多于异。在九大后，林和周在政治上也是同多于异。但当毛一旦决心要倒林的话，周在最后的时候还是倒向了毛，为了在政治上保留自己的晚节。

#### ◇ 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

问：我们现在来谈谈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我们看到在文革中，周恩来有过一些吹捧江青的话，甚至有些肉麻的话。那他和江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高：周跟江的关系，如同周和林、及周和刘的关系是一样的。更核心的是周和毛的关系。文革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江青开的夫妻老婆店。毛是舵手、是发动者，江青是文革女老板、女掌柜，而且地位是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对她低三下四，隐忍退让和那种让人肉麻的吹捧，根子还在于江青由于毛的扶植撑腰，在政治上的份量越来越重，他不得不这样。

问：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文革后期江青却主导了整周的运动？

高：您说的整周运动指的是批林批孔运动吗？

问：对。

高：这个过程，如果讲起来话题就比较长了。这个批林批孔，我这本书上讲的呢，就是毛发动批林批孔的两大情结。一个是历史文化观上的反儒情结，一个是现实政治中的文革情结。而批周呢，是把毛的这两大情结融汇贯通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清楚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话题就比较长了。从现实政治中，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提出批左，这个触到毛的痛处，认为周企图清算文革。当然，这个周已经做的是再谨小慎微不过了，绝对不从根本上触动文革，而是把文革中出现的一切乱象乱局都归咎于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就这样子，老毛都看出来，不能这么搞，所以他要刹车。另一方面，毛周之间的关系，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俩之间还有一个儒法之争的问题。周被毛认为是中共党内儒家文化集大成的人物，这个是被毛非常不齿的，毛认为儒家的这一套玩艺，表面上谦谦君子，温良恭俭让，实际上是虚伪，非常伪善圆滑，政治上没有原则。他就这样，把两者贯通起来了来批斗。就是说，由江青来批斗，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去咬谁，我就去咬谁。”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把所有批孔的事情都归咎于江青，这是过份地抬举了她，她不过是在贯彻毛的意图。

问：你介绍的这些情况和中共目前的官方历史版本不一致，官方的版本说，在文革后期批林的时候，江青或者四人帮把毛的批林批孔运动转移到了批周公。

高：这就是后来中共领导层在政治上的需要了，他们需要维护毛啊。实际上我认为毛是文革中一切恶事的始作俑者，不仅是大的关节，即使是小的事情，没有他首肯，底下的人做得出来吗？江青是不敢，不过江青有的时候有操之过急、有打击面过大的这一面，但是基本思想是出自于毛，这是没有问题的。我的书上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引用的是详细的材料。

#### ◇ 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关系

问：那我们再来谈一谈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通常的看法是，邓是周的接班人，是周自己在身体不好的时候力荐的一个接班人。那么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高：恰恰相反。邓的复出是毛在政治上的重要一招棋，有意用邓来牵制乃至取代周的，恰恰不是周的力荐。外界称我这本书颠覆了一些官方的历史定论，周邓关系也算是其中之一吧。

实际上，周邓之间的关系，谈不上怎么好，当然两个人在当年旅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同时去了欧洲，但是，两人情况非常不一样。旅法前，周在国内已经崭露头角，而且随后马上就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而邓当时只有十六岁，可以说是一个玩心未泯的少年。当年那些在法国的老同学写的回忆录中提到，那时候打完工，已经疲劳不堪，如赵世炎，那时下工以后还拼命学法语。而邓两手插在兜儿里面，串门儿聊天，打扑克。用我的话说，是玩心未泯，因为邓才只有十六岁，你怎么能要求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呢。所以虽然他和周有留法这段同样的经历，但情况是很不一样的。

回国以后，两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因为中共在党内斗争中是以毛来划线的。如果你站在毛的这一面，就是正确的一面。周站的是错误的一面，所以这是毛周恩怨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周取代了毛作为红军总政委，毛坐了冷板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连鬼都不上门儿。这是毛事后说的激愤的话。邓那个时候是和毛一起挨整的，所以邓和毛的关系更深。而且正是因为邓和毛一起挨整，所以遵义会议以后，邓立刻从下面调到中央当了秘书长。当然目前在国内有人把秘书长这个职位吹的很大，其实这个秘书长和后来的中央秘书长是不一样的。这实际上只是个秘书处。不过毛一旦翻身，就把邓提拔起来，而且一路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格外的培养。

邓和林彪是毛一直刻意培养的人物，而且交替使用。邓是搞政工出身的，当时在解放战争中毛把他作为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指挥二野和三野。这点邓是颇为自负的地方，处处和林彪比，认为你是有辽沈，我有淮海。而且言外之意林彪你最多指挥过一个四野，我却在淮海指挥过两个野战军。从这些事上来看，邓是受到了毛的格外栽培。所以江西挨整是邓人生中的一个机遇，从此之后他就一路青云直上。在八大的时候，邓比林彪还先进入政治局常委。林彪是八大之后增补为副主席的，排在邓小平的前面，但在八大的时候他还是政治局委员，而邓那时已经是政治局常委了，而且毛指定他作为中共总书记来总揽全局，党政军的日常事务都要向邓汇报。后来更进而说他是“副帅”。周当时是中央第三号人物，党的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但周事事也需要向邓去请示汇报。因为毛定下了书记处是抓总的，大家都要向书记处汇报。

文革前夕，因为毛对邓在五十年代后期在政治上跟着刘少奇跑很不满意，所以就狠狠的整一下邓，转而重用林彪。但是毛对刘邓始终是有区别的。毛对邓是采取整而不倒的办法，邓自己也知道。邓在文革后曾说过，谁要不听毛的话，毛就会狠狠的整一下。林彪摔飞以后，整个文革等于全部破产了，毛在政治上陷入困景，而周在这个过程中则连连得分，党内外的声望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毛觉得周功高盖主，所以采取行动了，用邓来制衡周。人们所流传的所谓邓的复出是周的安排是不对的。事实恰恰相反。

问：那么，你认为后来中共有意无意地宣扬邓是周的传人是出于什么动机？

高：我的书里有一个部份描述了周邓之间的合作与分歧。我概括他们俩人的关系是和而不同，同而不党。邓是毛在政治上制衡周的一个棋子，邓自己心里面也很清楚，实际上邓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在73年政治局扩大会议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此得到了毛的信任。这点在我的书中讲得很清楚。毛和邓虽在历史上有老关系，但毛对邓还一直是将信将疑。因为毕竟邓在文革中被毛打入冷宫，吃了一些苦头，那么他在政治上能不能为毛所用，毛心里还是有一个问号，需要观察邓。通过批周一事以后，邓重新获得了毛的信任。

但另一方面，周和邓的治国理念是相同的。他们都知道要抓经济，在当时如何治理文革所



造成的乱局这个问题上，周和邓也比较一致。还有一点，文革后期，邓和周在政治上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在毛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时候，两个人就成了难兄难弟。之所以会这样，也和周的为人有关。套用中共的话来说是，周善于团结人一道工作。虽然邓是毛派到他身边牵制自己的人，但是周做了争取工作。况且两个人在政治理念上也是一样的，所以很自然的就在政治上联起手来了。

但是，周邓两人对一些具体问题看法并不完全一样。他们有一致的地方，比如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四个现代化，这就是周和邓两个人商量的，把它作为经济部份的指导思想来写。但是，两个人的同里面还是有异。比如说邓抓全面整顿，这一点周虽然同意，但是对邓操之过急的做法是有看法的，当时曾跟邓提过。平心而论，周在政治上比邓更加老谋深算，当时他看出毛还在看，看出毛对邓不是很放心，而邓是已经大权在握，毛已是重病缠身，不会拖很长了。

周当时的想法是应当戒急用忍，等着就行了，但是邓本人刚愎自用，这点从六·四镇压就可看得出来。邓的这种个性在1975年抓整顿和1989年六·四镇压都有充份的体现，他就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至于中共官方说邓是周的传人，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 ◇ 对周恩来的总体评价

问：那么谈到对周恩来的总体评价，如果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是对中共来说，另一方面是对整个民族来说，您认为周的正面意义大还是负面意义大？

高：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来谈，没法搅在一块。

一方面，周对中共来说绝对是有功之人。原因大体有两个。一个是周在文革中把乱局给稳住了，使得毛最后在政治上没有大翻车。文革的乱还是有控制的，尽管是在失控的边缘，所以，在这一点上周是功不可没的。

第二，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时，胡耀邦总结历史经验时，对周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因为周的存在，使党多次在危难中没有陷于分裂；同时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因为有了周，得到了人们更多的谅解。换句话说就是，最后没有拉出山头来，在政治上进行厮杀，大家最后都还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面。所以从这两点来看，周对中共来说，是绝对的有功之人。至于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文革是一场浩劫，周是文革的执行者，难逃历史责任。当然这里情况也很复杂，周是一身二任的人物。

我在书中引用了当年邓小平在内部写文革决议时评论周的两句话。第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的话，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第二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革也许不会拖那么长。”这两句评论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而周对国家和民族的真正位置实际上也就是在这两点之中。

问：为什么在有负面评价的情况下，中共，包括邓小平，在文革后依然把周恩来塑造成一个神一样的人物？

高：当时，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

第一，人们在四·五运动中悼周，其实有好几个原因，一些人认为周是人民的好总理，另一些人则是对毛不满，但通过悼周来批江射毛，影射毛是中国当代的秦始皇，这在四·五运动中已经喊出来了。就着这股势头，在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周起了导火索和旗帜的作用。毛也没想到周去世以后，还阴魂不散，在政治上给他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本来毛一直在天门城楼上接

受人民的三呼万岁，没想到四五运动中天安门广场百万人示威，指他是现代秦始皇。毛也知道他的一世英名由此毁于一旦。所以毛在临死前还琢磨着想批周，他不参加周的追悼会，并非身体不好，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共把周恩来放在很高的位置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让他来取代人们心目中毛的位置。因为毛发动文革，很多事情人们对他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用周，用一个新的神，或者说用一个泛神的办法来取代原来摇摇欲堕的老神。另外，从胡耀邦对周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周对中共党内团结的凝聚力是很大的。所以他是不能碰的。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周是个忠君爱民的贤相，他的私生活，他的廉洁奉公，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一直是道德上的楷模。相对于目前中共的贪腐，更让人们怀念他。普通老百姓不懂得更多的政治，但是他们看人更看重这些东西。所以现在许多事情曝光以后，一些人仍然很怀念周恩来，也能对他所做的事情给予谅解。

问：在中国，毛和周长期被认为是两个神。毛泽东这个神因为后来一些书的揭露而被拉下神坛，比如李志绥写的回忆录揭露了毛的许多鲜为人知的道德上的问题，彻底粉碎了毛的神的形象。那么从道德上讲，周恩来有没有任何受人指摘的事情呢？如腐败、生活作风等问题？

高：据我所知，这恐怕是没有。在我接触有关周的档案材料和他身边的人这么多年来，我没有看到周恩来有过任何象毛生活作风那样的事。

问：你是不是说，如果周恩来神话破灭，主要因为他的政治品德有缺陷，而非个人生活品德有缺陷？

高：对。我认为包括对毛的评价也是这样，毛可以生活上很糜烂，李志绥讲的那些具体情况我无从置评，不过毛的生活作风不检点并不是一个秘密。我认为评价毛也好，周也好，真正让他们倒台的，不是生活问题，而是他们在当政时为中国人民带来了些什么。老百姓在这个年代是处于安居乐业的局面呢？还是风雨飘摇之中？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问：那么，中国人对周恩来的这种心态，如果放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反映了中国历史深层的一些东西呢？

高：是，确实是这样子。其实周在文革中的很多表现，比如对毛的顺从、隐忍、顺从，海外说他是向毛献媚、卑躬屈膝，所有的这些，其实老百姓也都知道。但问题是，这符合中国儒家政治文化的传统。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周是个忠君爱民的贤相，尽忠守份，尽到了一个臣子的本份。就算现在公布周恩来的材料，老百姓对他的所作所为也能有一定程度的谅解。因为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做大臣的不能逾份，要尽忠守份，周对毛这一点是做到家了。

问：那么您的这本书对剖析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什么意义呢？

高：这是有意义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皇帝高高在上，主宰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老百姓甘愿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皇帝，敬畏、顺从他的意志，听由皇帝来主宰一切。前一阵子，大陆风靡封建王朝的电视连续剧，就是这种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映照，希望皇帝能施仁政，那么老百姓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这个文化和民族心理是年深日久，根深蒂固。毛和周之间的君臣关系也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一个映照。毛是代表了君权，而周则代表了顺从君权的大众的民族心理，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其实从毛周时代过后，这种情况仍然换汤不换药。在邓当政时，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还是难逃“儿皇帝”的厄运。现在江泽民已经“半退”，骨子里还是不想把“核心”的头衔交给胡锦涛。谈到对周的历史评价，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要考虑。虽然毛、周这些人走入历史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但实际上还没有尘埃落定。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今

后对这些人的评价，取决于中共现在的当政者能不能够把中国这场大变革比较和平地实现——从经济改革完成向政治改革的转变，最终走上民主宪政道路。如果完成得好的话，对毛周这些人的评价还好说，如果这个转轨完成不了，导致一场大动乱的话，对他们的评价就真不好说了。

问：您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共党内担任了比较重要的职位，但您现在出版了这本书，把中国政坛上的另一个神拉了下来，那么，从您内心路程来说，您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呢？

高：在我的后记中我写道，这本书的写作是命运的安排，同时也是为我自己过去的一段历史画上一个句号。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过，曾经当过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为官方修史，写领袖人物的年谱、传记。本来，我可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不过当时已经感觉到只能在夹缝中做文章。四人帮粉碎后，中央作了历史决议，决定对文革宜粗不宜细，这是邓的话。那时我的研究工作也很难。

第一，文革是个禁区，不能碰，只能宜粗不宜细。再有，周是政治上的偶像，不能碰。所以当时我看材料时虽有很多想法，但深为不能畅言所苦，只能写一些奉命文章。1989年那场爱国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当时文献研究室有三个室务委员，另外两个原来都是胡耀邦的秘书，带着机关干部到街上去游行。我和他们一块儿去了，另外我还执笔起草了一个中央文献研究室请愿团致中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要求中共的当政者能够倾听民众的呼声，肯定八·九是个爱国民主运动，因为当时不是有个四·二六社论吗，把它定性是动乱。另外还希望推进政治改革，整治腐败，从最高领导人做起，取信于民。后来，我就成了清查中的重点人物了。

你看我书的后记就很清楚了，实际上我们单位还是尽可能地保我，希望保我过关，还继续让我担任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份的执笔人，希望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继续为党的文献事业作贡献。当时说句实在话，哀莫大于心死。六·四镇压这种血写的事实，让我没法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象以往一样去写东西。这本书的写作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一边关在屋子里写检讨，交代问题，一边我在思考六·四镇压和文革浩劫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从那时开始，我就决定不再讲违心的话了。我要写一本以史为鉴，告诉老百姓真相这样一本书。我最初的写作念头就萌生在那个时候。

□ 采访者为BBC中文网记者

~~~~~

【秉笔直书】

高文谦为什么写《晚年周恩来》

• 慕育金 •

在高文谦新作《晚年周恩来》后记中，他一开始就说，“本书的写作完全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同时也是为了了结自己过去的一段历史，给它划上句号。”

到美国之前，高文谦已经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十几年，这使他有了接触机密史料的难得机会，“整天泡在卷帙浩繁的档案堆里”，接触了大量不为外界所知的文献材料，并曾经亲自采访过王力、吴法宪、乔冠华、纪登奎、耿飆、黄华等文革时期许多历史事件的关键见证人。他的同事有的曾经担任过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高文谦不仅担任周恩来研究小组组长，还是这个中共党内最高研究机构之一的“室务委员”。以他对于中共内部文献的掌握，加上身处海外自由研究环境，高文谦得以实现把他自己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告诉国人，

以史为鉴”的想法。

《晚年周恩来》就是他最新的写作成果。

◇ 林则徐的后代，父母投身抗日

按照中国官方标准的“成份划分”术语，高文谦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在抗战时期投身中共革命的青年。然而在中共取得政权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们却因不认同党内的左倾思想，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受到残酷无情的政治迫害。

在高文谦记忆中，最让幼小心灵感到恐惧的是看到父亲整夜整夜地写检讨。在1960年代初期中国发生大饥荒的岁月，他的父亲被流放到西藏，家中只有母亲一人靠微薄的工资抚养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虽为干部子弟，高文谦从未像政治当权者的后代那样享受到任何特权，反而从小就从父母遭遇中体会到专制体制的冷酷。

高文谦他的母亲是清帝国晚期最具有爱国精神的官员林则徐的后代。她充满坎坷和磨难的一生“恰好是整个中华民族苦难史的一个缩影”。据高文谦介绍，他的外祖父为林则徐曾孙，满清翰林，在军机处任章京，后曾担任满清政府留美学生监督，在美国生活9年，学贯中西，回国后在北洋政府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并进行实业救国，开办工厂。高文谦的母亲虽然出身名门，但在民国初年因为父亲办实业失败，家道中落，因此从小就有忧患意识，为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成为林则徐家中第一个走出家门，抛弃大都市生活，投身共产革命的后代。他母亲曾就读于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但是年轻人的革命激情促使她离开北京，到河北山西一带的中共根据地参加抗日作战。在那里她结识了燕京校友，同样是在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的丈夫。

高文谦的父亲高天辉同样出身书香门第。他祖父是满清末年举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校友。高天辉少年时曾进入福建马尾海军军官学校，但不堪受恶少欺侮，愤然离开，后又考入燕京大学。在抗战初期，高文谦的父母与那时投身到中共阵营的革命青年一样，理想就是赶走日本侵略者，然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国家。

◇ 体味政治残酷

由于高文谦的父母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中共阵营中是不可多得的知识青年，很快就获得重用。他们熟悉的同事中包括张春桥等后来在中共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到中共取得政权时，高文谦的父亲已经是军队高级干部，任总政青年部副部长，并担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与胡耀邦共事。母亲曾在中央党校担任历史教员，研究唐宋历史。然而好景不长，父亲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在中共党内较早看出各种负面问题而接连受到政治打击，在庐山会议后更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被流放到西藏。母亲在连年政治运动中，也无法实现研究历史的愿望。

高文谦的儿童时期就是在这些政治和家庭变故中渡过。他现在还记得父亲被流放后，津贴被扣发，供给被取消，在饥荒岁月物价飞涨中，母亲如何艰难地抚养五个孩子。为了喂饱孩子，他母亲不得不到邻居家中借饭票，当高文谦拿着饭票到食堂要买几个烧饼时，却被当众拒绝，理由是他的家庭“不够资格”。高文谦幼小的心灵受到深深的刺痛，由此感受到被整个社会所歧视的痛苦。

高文谦的父亲后来虽然回到解放军总部重获要职，但终究身体遭到摧残，因癌症去世，胡耀邦和罗瑞卿、张爱萍、杨成武等将军都亲临他的追悼会。

由于狱中惨无人道的身心迫害，高文谦的母亲最终患精神分裂症，“四人帮”倒台后才被释放出来治病，亲情关爱使她逐渐恢复正常。对于高文谦来说，他父母一生的坎坷遭遇，是使他认识到党内政治黑暗残酷的最直接的材料。

◇ 不愿再作御用学者

在文革之后中国政局相对平静的改革时期，高文谦曾经担任《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在中越战争期间赴前线采访。然而他真正的志趣在于研究历史，继承母亲对于历史的兴趣和爱好。

高文谦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很快就凭藉自己的勤奋和聪明，成为年轻一代研究中共历史文献，特别是有关周恩来等高级领袖人物档案的骨干力量。他对于材料的掌握每每获得老辈同事的称赞，他的研究文章也经常发表在权威报刊。

即使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高文谦因为支援学生的爱国民主行动受到政治审查，领导仍然器重他，希望他继续研究党内文献，继续担任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份的执笔人。

据高文谦说，他是受父亲影响，不愿屈服权势，喜欢打抱不平。在他看来，他所服务的政党已经成为“为一党之私利，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政党，他所作的工作是在“充当官方御用学者”，做“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他的良知无法让他“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史家应秉笔直书，不畏权势、不受利诱的中国文化传统，通过他父母的言传身教，已经灌注于他的血脉。在历史与权势必居其一，高文谦无可选择，他主动辞职，来到美国，在写作自由的环境中继续从事历史研究。

在美国，高文谦在哈佛大学研究文革史，费正清研究中心等收藏的文革资料为他提供了解海外研究者的观点和角度。他还曾经在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进行中美和解课题的研究。高文谦认为，海外学者难于获得第一手资讯，有时只能分析推测；而在中国体制内的研究者，虽掌握一些资料，则往往又因禁忌繁多，而三缄其口，欲言又止。高文谦则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克服这两方面不足。他看到自己的优势，也看到自己的责任，广泛收集材料，潜心研究，前后历时两年多。

高文谦在新作《晚年周恩来》的后记中表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一是要“重新评价周恩来，剥掉涂抹在周身上的油彩”，还原他所认识的周恩来的本来面目；二是要“揭露大陆官方刻意遮掩的文革黑幕以及高层政治的荒谬、黑暗和凶险”。他希望这本书能够“引起海内外学术界乃至大陆民众的文革这段历史的关注，检讨反思这场浩劫的制度根源，推动大陆自文革后换汤不换药的政治体制改革”。

由于有人试图阻止他出版《晚年周恩来》，高文谦在母亲去世的时候无法回到中国为老人送终，料理后事。他在一篇《哭送母亲》的悼文中以赤子之情表达对母亲坎坷一生的回忆和追思。在这位旅居海外的中共高层政治史的研究者心目中，《晚年周恩来》这本书是母亲培育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培育的结果；是献给母亲的，也是献给中国人民的，母亲与中国人民，在出版这本新书的此时此刻，二者合而为一。

□ 本文为多维社的专访报导

~~~~~

#### 【往事追忆】

##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

• 高振普 •

### ◇ 出席关于罗瑞卿的上海会议

1965年12月5日，周总理让我们准备飞机去上海。邓大姐知道后，问总理这么突然去上海有什么事。当知道是毛泽东主席召见时，她也就不再问了。因为毛泽东在外地召见的次数太多了，她不便问什么事，只是问大概要多长时间。总理说：“只说有事，不知什么事，大概一两天就可以回来。”我们从他俩的对话中估计时间不会太长。不过根据多年的经验和习惯，我们为总理准备外出的行装是很充份的，出去一天和出去一个月所带的衣物一样多，甚至于还要带一些适应天气变化和再改变去处的衣物。我们个人所带的换洗衣服就没那样充份了。记得那次去上海，我只是带上了洗漱用具，说是一二天就回来，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

到了上海，总理住锦江饭店南楼十四层。当天，毛泽东召见了总理。晚上周总理就叫秘书周家鼎了解刘少奇主席的行踪，此时刘主席出访亚洲四国，回国后打算在昆明休息几天，得到毛泽东主席请他开会的通知后马上飞到上海。几天之内，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的部份同志和有关省、部队的负责人陆续到了上海。12月8日会议开始，是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内容我们这些警卫人员一无所知。与会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住锦江南楼。毛泽东、林彪不住在这里。会议规定工作人员不得相互走串，不得离开酒店上街。规定制度的本身是与会议相适应的，严格保密，怕走漏风声。首长去开会，规定警卫人员只准把首长送到电梯口，不得跟随至会场，常委的警卫人员也不例外。

随领导同志来上海的工作人员，大部份不知时间长短，可有一条，谁也没估计到会开得这么长，也从来没规定过这么严格，连街都不能上。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脚上的袜子只有一双。当时是冬天，上海不断地下小雨，较厚的尼龙袜，当晚睡前洗了，第二天又不会干。应我们工作人员的要求，上海接待处经请示会议批准，临时在锦江北楼设一小卖部，以便我们去买换洗的衣、袜。借去小卖部的机会，到院子里透口气。说实话，一天到晚在楼内呆着真难过。

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我们虽然不去打听会议内容，因工作关系也会听到一言半语。觉察到身为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出了事。这在“文化大革命”前真是天大的事呀，是继高岗事件、彭德怀事件后的又一大事件。由于不了解事件的真相，心里更怕。

成元功和我，还有保健医生卞志强随总理到上海，看到这次会议的情况，特别当知道是罗瑞卿的事情后，在总理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聚在一起，议论上几句。总理来得这样匆忙，对大姐说一二天就回去。党内出了这么大的事周总理事先一点不知道，刘少奇主席也是临时由昆明赶来上海开会，也会感到突然。另外，叶群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她既不是政治局成员也不是书记处成员，她怎么来参加会？还有她的女儿也跑前跑后，这到底算个什么会？我们的议论是无边界的，但也不是捕风捉影，最后还是落到这会什么时候结束，这会的结果怎么样，罗瑞卿会怎么样，因为他一直是我们的老首长呀！

12月15日，会议结束了。我们虽不知会议的内容，但已比较明确地看出这次会议是针对罗瑞卿的，属什么性质的问题搞不清楚。我们这一家除周总理就属周家鼎最清楚了，他们谁也没对我们透露半句会议的内容。

时任警卫局副处长的孙勇把我们各家召去开会，宣布回北京分乘几架飞机的名单。周总理、

邓小平、李富春和罗瑞卿合乘一架飞机，最后离开上海。当听到这个乘机名单后，我有些放心了，猜想着罗瑞卿的问题不会太重，不然的话，为什么能和两位常委同坐一架飞机呢？回来我对成元功一说，他也有同样的看法。

12月17日上午，飞机由上海起飞，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罗瑞卿围坐在一块，相互交谈着，看得出，他们都很沉闷。罗瑞卿总长显得更为憔悴。回到北京后的很长时间，看不到罗总长参加什么会议，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样被推下万丈深渊。

我再次看到罗瑞卿总长，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打、砸、抢时代。在北京乒乓球馆，他被红卫兵用筐抬到会场，与彭真、杨尚昆、陆定一共同挨斗。这场面，惨不忍睹呀。由于长期在中南海领导人身边工作，对这些领导人有一种自然的感情，虽然对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敢怀疑，但对一些领导人这样被批斗，感情上实在不能接受。

1978年8月，罗瑞卿同志为了更好、更多地工作，想把“文化大革命”中致伤的腿治好，在手术的过程中不幸死于心脏病。

#### ◇ 寻找彭真

早在1966年3月彭真就被扣上了“包庇坏人”的帽子，罪名是“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5月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由李雪峰、吴德分别担任北京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彭真被免除职务，靠边站，住在家里，等待批判。

北京市委改组后，跟着就是对北京各大专院校领导人的更换，各大专院校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灾区”。因而各大专院校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们造反的势头很大。

谁也不曾想到，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12月4日，彭真被人绑架了。秘书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消息。这是建国以来最惊人的事件。虽然我们的国家搞了像“三反”、“五反”、内部肃反，包括“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也未发生随便抓人的事情，更何况对领导人，特别是对彭真这样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人，为革命作出过非凡贡献的人。虽说毛泽东批评过他，但只是在党内；虽然他不当市委书记，可还是政治局委员，怎么办应由组织上决定，怎么能随便抓人呢？

周总理接到报告，很着急，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商量办法，分析是哪些人所为，把当时北京有关的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约到国务院会议厅。

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到了。周总理说明今天约他们来的用意，向他们打听彭真同志的去处，绑架是何人所为。造反派几个头头相互耳语了一番后，一位女学生开始说话，承认是他们干的。

总理严肃地说：“你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极端错误的。”总理叫他们马上把彭真同志交出来。几个造反派头头辩解说，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是“向修正主义开火”，是为了叫彭真老实交待问题。

总理说：“彭真同志的问题，应由他向中央交待，而你们这些学生，不应干预中央的事情。”

会议进行了几个小时，仍然没有结果。总理有意想把气氛缓和下来，对他们说：“同学们如果觉得抓走了，自己放回来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说出把彭真同志关在哪里，说出地址，由我派人去接出来也可以。”

造反派们看到了周总理的严厉态度，说话的口气虽然缓和下来，但仍不肯把彭真交出来。他们相互推诿，说是今天来的人谁也不当家，无权答应放人。还是那位女学生开了口：“请周总理放心，彭真住的地方很安全。他一次可吃两个窝窝头，我们回去后商量一下，再告诉总理。”

周总理也看出，今天不会有结果，就向他们规定了几条：

- 第一，彭真同志的安全你们负责，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
- 第二，不准打骂、体罚。
- 第三，不准不给饭吃。
- 第四，不准再转移到其他地方。

散会后，周总理把北京卫戍区的同志留下，指令他们派出人员，一定要找到彭真同志被藏的地方，想办法营救出来；对其他领导人的家严加防范，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还特意指出像万里同志，一定不要叫他们抓走。

#### ◇ 约陶铸谈话

1967年1月4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接见广东来京的红卫兵会上，突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中南局镇压群众的总后台”。几乎与此同时，中南海周围的街上就贴出了揪陶铸的大字报，游行的队伍也随之而来，声势浩大。可见是事先已作了布置的。对这内外相呼应的局面，周总理也感突然。在这之前周总理已知江青在毛主席面前诬告陶铸。总理在毛主席那里肯定过陶铸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讲话，不是镇压群众。

怎么办？陶铸这位中南局的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转眼间，被宣布为毛泽东的对立面，成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江青等人善用突然袭击的伎俩，这已不是新鲜事。雍文涛、周荣鑫、吕正操就是在“文革”开始时，被江青在红卫兵大会上点名出局的。可他们都是部长级的人物，而像陶铸这样的政治局常委，也同样可以被江青一点名就垮下台来，确实惊人，可见党内不正常的现象正在逐步升级。

就在江青等人宣布陶铸是“保皇派”的同时，陶铸正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幸而被接见的那些小将们不知陶铸已经倒霉，不然的话，他们群起哄之，会把这接见的会场马上变成批斗会。周总理等陶铸接见结束，约他来西花厅。此时，陶铸本人还不知自己出了事，进门时还说了句“要不是周总理叫我有事，那些红卫兵还不会放我走”。

在周恩来办公室，两人相谈很久。总理送陶铸出来时，陶铸低头无语。周总理心情沉重地与陶铸握手道别。这以后，周总理再也没单独见过陶铸，而陶铸只好隐居在中南海的万字廊。

#### ◇ “他俩是‘五一六’我不信”

“五一六”是指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1967年七八月间，北京街头出现的署名“五一六”兵团的标语中有些是攻击周总理的。这当然有人在幕后指挥。当时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后来又出现“谁反对江青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但是“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却出现很少。但是，“五一六”兵团攻击周总理，是群众起来把它定为反动组织的。“五一六”兵团的寿命不长，但影响很大。全国掀起揪“五一六”兵团成员的浪潮，派系之间也以“五一六”定罪。由于斗争的扩大化，就很容易错划了一些“五一六”分子。周总理曾经指出，



“五一六”是少数，不要扩大化。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机会搞扩大化，把揪“五一六”分子推向全国，以证明反周总理的人很多，为他们以后的“倒周”制造影响并打下基础。

万万没想到，扩大化扩大到周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位国务院机关的干部，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另外一派就对他实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的政策。他被定为“五一六”自感冤枉，于是就来个以攻为守的“坦白”，把张树迎和我“坦白”了出来，说我俩是“五一六”分子。说我们一旦有了机会，会对总理下毒手。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很快面报周总理。周总理当然不信，说是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给别人定性，不可靠。“老张（树迎）、小高（振普）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从他们的工作表现说他俩是‘五一六’我不信。”以后的事实证明，周总理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 ◇ 不能离开中南海

1967年夏，“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轰轰烈烈”，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对刘少奇的攻击更加公开，更加猖狂。造反派冲击国务院，围困中南海，揪批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开攻击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并纠集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组织，于7月18日晚，把刘少奇、王光美揪到工作人员食堂，批斗两个多小时，进行人身攻击。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操纵下，首都一些高校、机关团体的红卫兵、造反派数万人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高音喇叭不停地叫喊，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当然他们不只是“揪刘”，谭震林、陈毅、陶铸等也是他们揪斗的对象。红旗、标语、漫画布满了府右街道路两侧，后来扩展到中南海北门的文津街、南北长街，以至于新华门前。这些人，不分昼夜地狂呼乱叫，要把刘少奇等揪出去。7月26日和8月2日，谢富治、戚本禹还亲自到“火线”看望，支持他们的行动。戚本禹“水到渠成”的谈话，鼓励红卫兵坚持下去，把“揪刘”活动推向高潮。

中南海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部署是很严密的，八三四一部队是听党中央指挥的。中南海各门都有部队重兵把守。“中央文革”只能调动红卫兵。红卫兵与警卫部队面面对峙，时而发生冲突，红卫兵冲，战士挡。战士们遵照周总理“不动火，不动气，不打人，不抓人，作宣传”的指示，红卫兵始终没能冲入中南海。

有些高校的红卫兵，还以绝食相威胁，他们声称，不揪出刘少奇，不吃饭。实际上，他们喝的水是甜的，后来发现，他们交替着吃饭，吃完东西再回去继续“绝食”。所以虽然“绝食”持续了好几天，但却无一人饿倒。

时间一天天过去，红卫兵、造反派围困中南海的人数逐渐增加。我们有时走出来，看看他们这“革命”的场面。天气炎热，说真的，这些人也够“辛苦”的。什么时间收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他们是受人指挥的。他们的目标根本不会实现，中南海进不去，揪人更不可能，他们的幕后指挥也清楚这一点，只不过是把这些学生们推出来，替他们充当先锋，搞点声势而已。

中南海的新华门、东门、西门、北门、西北门已被红卫兵围堵，车辆出入很困难。周总理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办公。外出开会，只好走便门。

夜深了，劳累一天的周总理还要处理积压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墙外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打倒这个、揪出那个的口号。靠近总理睡觉房间的围墙外，由于造反派高高挂起六个高音喇叭，轮番呼叫，吵得总理很难入睡，他只好加大安眠药的用量。这样一天天地下去，造反派可以轮流休息，可以劳逸结合，周总理却不能，睡不好觉，第二天还要继续工作，怎么办？我们几个人商量，建议搬出去，找个安静的地方，睡好觉才能应付这天天的接见、开会。总理不接受，他笑着对我们说：“毛主席、朱老总他们都住在中南海，这里是中央所在地，怎么能离开

呢？”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围困中南海的场面何时结束。总理卧室的窗子只有一层玻璃。我们建议再加一层，这样会降低一点外边的嘈杂声，让总理多睡一会儿。总理不同意，说这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多吃一点安眠药就可以了。被吵醒后，他就看文件、办公。

有一天，总理睡在床上，没有听到外边的高音喇叭声，他风趣地说：“他们天天喊，也太累了，今天也休息了，我会不会因为没有喇叭声而睡不好？”我们被总理的话逗笑了。说来也怪，人们是容易适应环境的，总理也不例外，听久了，习惯了，似乎影响不大。哪晓得，造反派们又使出了新的花样，他们在歌声、口号声中，加上了放鞭炮。这不停的爆竹声，更使人难以入睡，睡着的周总理常被惊醒，只好起床办公。

由“中央文革”操纵的“揪刘火线”，无论采用什么方式，使尽了什么招数，也没能攻破守卫中南海的八三四一部队的防线。长期下去，他们也是困难重重。红卫兵们吃不好睡不好，天气炎热，污水、垃圾不能及时清理，有的人开始生病了。他们也感到如果这样坚持下去，不会有太好的结局。

终于收场了。他们要“体面”地收场。8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集百万人的“声讨刘少奇大会”，党中央及“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都到天安门参加了大会。

中南海内，由“中央文革”精心组织，分三个会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面对面的批斗。

周总理要去天安门，但他不放心中南海的批斗会。头天晚上，他就分配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分别去三个会场，观察动态，如有过激行为，马上向他报告。大会结束后，秘书分别向总理报告了三个会场的情况，总理听后很沉闷。

自此以后，刘少奇就失去了自由，与王光美被分隔看管起来。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碰见了刘少奇的贴身警卫科长。他手提菜篮到副食店买佐料。我奇怪地问他：“你不是住在北长街吗，怎么到这边买东西？”他叹了一口气说：“给少奇买的。”

“怎么……”

“不是也造反了吗？”

我们俩握手告别。

我把这事报告了总理。总理指示有关单位，对少奇同志在生活上还要保证供应。

从那时起，对于刘少奇的处境，身体状况，总理都亲自写信向毛主席报告。刘少奇因生活居住条件的变化，精神上的刺激，很快病倒了。总理知道后，指示新华社记者，把刘少奇病在床上的情景拍下来，向毛主席报告，让毛主席看看刘少奇已被折磨成什么样子。

“揪刘火线”搞了一个多月，周总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地生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逐步理解了周总理为什么不能离开中南海。

◇ 周恩来、邓颖超的收支情况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结余部份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钱（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止到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合计46864·18元，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份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 作者1961年起任周恩来的卫士、1983年起任邓颖超警卫秘书。本文摘自《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

【外论摘要】

“文革”中的周恩来。

· 矢吹晋 ·

◇ “消防队长”周恩来

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所起的作用十分明显，那么，周恩来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在1966年8月下旬到12月中旬的三个多月里，周恩来出席过40多次红卫兵的大型报告会、座谈会等，小型的、个别的会见谈话就更多了。这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

周恩来一方面巧妙地躲开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努力工作，告诉他们：建国

1967年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当然也有缺点。犯方向和路线错误的当权派跟“黑帮”不同，他们不是反革命。

周恩来在审查1966年国庆节的《人民日报》社论时，亲自把稿子改成：如果不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造成严重后果。

当年10月，毛泽东提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去同毛泽东研究，他提出异议，指出以前在中共的政治里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毛泽东没有采纳。于是，周恩来改变战术，他通过强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试图缓和和对当权派的攻击。

周恩来的这种态度被江青、陈伯达等文革促进派说成是“和稀泥”。“文革”初期的理论家王力、关锋在《红旗》杂志的社论中提出“反对折中主义”。文革促进派攻击周恩来是“折衷主义”，是“消防队长”等等。然而，周恩来确实是不倒翁，他打不倒。相反，妄图打倒周恩来的王力和关锋等人却被当作极“左”派给赶下台了。

1967年刮起上海一月风暴。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军委干部一起发布了《中央军委命令》，要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禁随便抓人和体罚。

在2月中旬的会议上，当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革”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时，周恩来责问了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等人。因此，江青攻击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

1967年8月7日，王力组织批斗外交部长陈毅，号召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其矛头指向陈毅的直接领导周恩来。由于当时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全国的混乱局面达到了顶峰。

对文革派的做法强烈不满的武汉军区领导，不仅镇压了造反派，而且在武汉发生了支持当权派的部份群众以软禁来劝导毛泽东的事件。只是由于周恩来的机智，毛泽东才得以脱险。

通过这件事，毛泽东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了。他8月末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决定让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同时，确认了外交大权属于中央，由周恩来负责。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把中央文革小组当作加速器使用，而把周恩来的行政领导能力作为制动器来使用。然而，在两者发生激烈冲突时，毛泽东不得不选择周恩来的行政领导能力。而且，以这种形式平静地表现出自己实力的，是周恩来一流的工作方法和抵抗方式。

◇ 伍豪启事问题

1967年12月23日，落款为北京大学第6406号信箱的一个人写信给毛泽东，检举周恩来。信中讲的是1932年2月上海报纸轰动一时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事件（伍豪是周恩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用的名字）。

那是一起国民党的阴谋事件。当时国民党造谣说，周恩来脱离了共产党，企图以此削弱共产党的影响。然而，由于当时的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无法否认这条报导。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于1968年1月批示：“此事已清楚，是国民党造谣。毛泽东1月

16日”

然而，火种并没有熄灭。1968年5月，当“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进一步蔓延，“打倒一切”的风潮大作之时，又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周恩来于5月19日不得不给毛泽东写信说明情况。

毛泽东阅后批示：“请文革小组各同志传阅保存。康生、江青同志已阅”。就这样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事情还没有完。周恩来于1972年6月23日就这个问题专门写了报告，而且让邓颖超整理录音。周恩来还在1975年9月20日第四次上手术台前用颤抖的手在这份记录文件上署了名。这是针对江青集团可能在周死后重提这个问题而采取的防范措施。

周恩来为抖掉溅落在自己身上的火星做出了很大努力。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无需这样做了。像周恩来这样有名望的革命家都为捏造的报导而大伤脑筋，由此可见身负不实之罪而哭泣的革命家一定大有人在。

◇ 为保护干部而奔走

周恩来用他那绝妙的斗争艺术保护了许多干部。周恩来把一批批被批斗的领导干部安排到中南海或安全的地方住。他反复做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工作，要求他们尊重宋庆龄等名人。

他要求造反派不搞武斗要文斗。指示保护政协机关和民主人士，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采取直接的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额尔德尼等宗教界领袖，他打电报指示要保护赛福鼎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

周恩来想方设法保护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著名科学家。他批示不得改变遭到批斗或解除职务的党内外干部的工资待遇，保证他们的生活。

周恩来有时根据毛泽东保护干部的批示列出应保护的名单。在制定保护干部的措施后，再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例如，他命令傅崇碧秘密保护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20几位大区和省级领导干部。

然而，尽管做出种种努力，党政军干部还是遭到很大损失。周恩来不可能处理所有问题，即便处理了，也不见得很理想。在“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分别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军委办事组取代，林彪和江青等人夺走了党政军大权。当时，幸亏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又参加文革碰头会，这样他可以在会议上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的50天里，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的造反派共5次，累计20几个小时。其中，一半时间是为了保护外交部长陈毅的。当时的造反派想通过打倒陈毅最终打倒周恩来。因此，周恩来全力以赴保护陈毅是理所当然的。

在保护贺龙的问题上，周恩来做了很大努力。1966年7月，康生诬告贺龙，说贺想把军队调进北京发动二月政变。12月，周恩来为了让贺龙好好地休息，把他转移到国务院新招待所。1967年1月7日，林彪亲自出马攻击贺龙，接着，贺龙的住宅被红卫兵查抄。于是，周恩来把贺龙转移到中南海西花厅。不久，中南海里又出现两个造反组织，中南海也无法保证安全了。周恩来又把贺龙转移到西山某处。

2月22日，江青逼迫周恩来就贺龙问题表态，遭到周恩来的拒绝。后来，江青等人终于查明了贺龙的住处，把贺龙藏到周恩来无法知道的地方。遭到迫害的贺龙在1969年6月9日死去。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才得知贺龙死去的消息。宰相周恩来被愚弄了，贺龙惨死了。

◇ 宰相的局限

江青于1966年12月给造反派发话，要他们把彭德怀从成都带到北京。彭德怀的所在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指示成都军区派战士和红卫兵一起来北京，而且在路上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在1967年7月审查委员会成立前，虽然彭德怀一直被监视着，但没有像后来那样遭迫害和拷打。保护彭德怀也是虎头蛇尾，最后彭德怀因拷打而惨死。

刘少奇的情况怎么样呢？1966年8月4日，江青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企图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上一言不发的只有周恩来和陶铸（当时的中宣部长）。9月召开了红卫兵万人大会，在周恩来讲话期间，当有人呼喊“打倒刘少奇”时，周把背对着听众，表示出反对之意。10月中旬，天安门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后，周恩来便派童小鹏予以制止。

1967年1月，在江青的煽动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揪到清华大学。周恩来得知后马上给蒯大富打电话，指示他把王光美送回家。7月，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等人动员百余个造反派组织约5000人在中南海西门外搭起帐篷，并用扩音器喊叫把刘少奇从中南海揪出来。周恩来亲自给造反派的头头儿们打电话，说服他们不要那样做。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惨死在开封。

很显然，周恩来对干部的保护有很大的局限性。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个小时至二十个小时。有时，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他自己曾对医生说过：“因为文革，寿命缩短了十年。”1967年2月3日，由于心情不好，又新添了心脏病。可是，当年夏天他还是彻夜地工作。1968年总理办公室被撤消，在周恩来的身边只留下两个秘书。尽管如此，年已古稀的周恩来依然在继续努力地工作着（注：矢吹晋著《毛泽东与周恩来》（日本讲谈社现代新书，1991年））。

日本中国研究家和田武司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一方面不得不附和“文革”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不断地试图阻止“文革”的过火行为，这在我们来讲是记忆犹新的。在红卫兵的集会上，他曾讲道：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两个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是代表党中央讲话的，所以我面前喊打倒他们两个人，这是给我出难题嘛！另外，当红卫兵的手伸向国务院时，他挺身而出保护了石油工业部长余秋里、外交部长陈毅、财政部长李先念、对外贸易部长姚依林、铁道部长吕正操等人。

他自己于1967年8月在人民大会堂被50万红卫兵围困两个昼夜。当时，他一个个地接见红卫兵组织做说服工作，最后让他们解散。据说江青、陈伯达、康生、林彪等文革派的大人物们当时都在北京，但是他们不想发出制止命令。

后来，北京街头又贴出“炮打周恩来，解放国务院”的口号。这样，十分明显他已经成为文革派的打倒目标了。

然而，尽管如此，周恩来没有被打倒。岂止如此，在以30年前西安事变时的本领解决了“武汉事件”之后，周恩来开始着手收拾“文革”的局面。那时，由于他的努力，就连“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都感到棘手的全国性大混乱的火势，总算渐渐减弱了。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恢复了对周恩来的信任。从此以后中国的政局便以他为中心发展了。

1971年以后中国的外交工作，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之感。

4月，开展“乒乓”外交。7月，基辛格访华。翌年2月，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9月，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系列事态发展，都是周恩来亲自经手的工作，是他确实已取代文革派掌握了实权的佐证。

周恩来在“十大”的《政治报告》中不容反驳地指责说，林彪及其追随者一伙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这种看法，恐怕也是对推行“文革”的急进派集团的激烈奚落吧。

“四人帮”对周恩来的进攻，在1974年3月至5月最为集中，这正好是邓小平复职后被重用的时期。

例如，在署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的题为《孔丘其人》（据说是江青加的题名）的文章中，讲述了孔子路过蒲这个地方时被起义群众包围的故事，以此暗示周恩来被红卫兵包围两昼夜的事。5月发表的梁效文章对周恩来进行了人身攻击。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所以拖延召开，是因为“四人帮”在暗中捣鬼。1974年10月，他们派王洪文到毛泽东那里告周恩来的黑状，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契机，试图组成他们的“内阁”。

这样，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容易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周恩来住院以后仍然在医院会见外宾等，没有中止公开活动。这可以理解成已意识到“四人帮”的干扰而采取的对抗措施。

人民代表大会恐怕也是根据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急忙召开的吧。他以重病之躯，亲自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据说毛泽东担心他的身体，特别指示要写一个最短的《政府工作报告》（注：和田武司，田中信一合著《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日本德间书店，1977年））。

日本成蹊大学教授宇野重昭认为，周恩来的政治风格，即使在1967年至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把这个时期的中国革命目标明确地定在“四个现代化”上。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他没敢违抗。他从毛泽东的革命言辞中慎重地选择语言，把它贯穿在自己的讲话中。而且，他尽力消除受到“四人帮”攻击的因素。同时，周恩来还保护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适当批判的所谓“当权派”。因为被称为“当权派”的许多人就是现实中为“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的人们。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着周恩来在中国人民中间享有很高声望的秘密（注：宇野重昭著“中国政治中的周恩来”，收入武田清子编《中国的开拓之路》（日本劲草书房，1992年））。

□ 作者为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教授

~~~~~

【史海钩沉】

周总理治病真难

• 佚名 •

1973年10月，周恩来作为一个癌症病人，在手术后本应该住院进行化疗，巩固治疗。可是他是一个特殊病人，化疗也只好见缝插针进行。

化疗才进行了两次，周恩来又一次面临精神的重创。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不久，中央叫他写党内十次路线斗争。

整整半个月，周恩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日夜趴在桌子上，写了撕，撕了又写，熬红了眼睛，熬酸了筋骨。因为老是低着头，他的眼肿了，接着脸肿了，腿肿了，后来连全身都肿了起来。但他全然不顾，还是不断写，不断撕。

邓大姐也不知道丈夫在房间里干什么，又不能进去说服他注意休息，着急地在门外来回踱步。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一点内情，可这是中央内部的事情，他们也不能多嘴。可是看见总理这样不顾惜身体，没日没夜地写东西，心里又是着急又是难过，以后知道总理背负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心里就更加痛惜！

要说最着急的是医生们，总理从把自己关起来写材料起，就拒绝进行化疗。

周恩来不见客，不开会，不刮胡子，一脸苦戚，一腔愤慨，长书万言。为保护比生命还重要的政治生命奋笔疾书，也为保护安定团结的大局面不惜委屈着自己。

委屈自己，痛苦自己，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些人有健康的心脏，却包裹在狭小的胸膛里，有强壮的身体却没有硬朗的脊梁。然而，周恩来有病的心脏却在顽强不屈的跳动，虚弱的身躯坦然地承受起莫须有的屈辱！

人只有在深哀和极乐时，才能显露你所有的真实，或是崇高或是卑俗。

后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作关于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讲话时，身边的工作人员才明白总理为什么拒绝治疗，原来他正在忍受心灵的煎熬，怎么有心情去治疗呢？

总理治病怎么这样难，竟然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啊！

□ 摘自《红照片》

〔编者按：象许多文革史料一样，国内出版物所载的以上一段史实吞吞吐吐。《晚年周恩来》一书提供了它的内幕——从（1973年）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为了给会议加温，扩大会议一开场，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周的最新指示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钟头，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危言耸听地宣称：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与会的多数人并非全都真心拥护毛的批周指示，相反却对周恩来心存同情。会上对周氏无限上纲、围攻批斗的场面，特别是江青指着周的鼻子大骂的阵势更是让一些刚刚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工农代表心惊肉跳，不寒而栗。……12月4日，他（周恩来）向中央政



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在此之前，周曾要求毛泽东，当面做检讨，却被毛一口回绝，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插手。……他（周）曾向担任毛联络员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来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他一下。结过遭到训斥，说是他企图通过她们摸毛的底。周只好作罢。更让周作难的是，现在别人对他避之惟恐不及，没有人敢给他通气，心里茫然无底，不知道究竟检讨到哪一步才算了结，只好一个人冥思苦想，最后索性照单全收，把会上安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硬加给自己，才总算交出了书面检讨。为了打消毛对他的疑心，周在检讨的末尾明白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